

符号矩阵视域下《里基-蒂基-塔维》跨文化叙事解读

陈禹洁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发布日期：2025年8月04日

摘要

《里基-蒂基-塔维》是鲁德亚德·吉卜林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本研究基于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分析文本的深层结构与文化内涵。通过探讨主要角色之间象征性关系，本研究揭示了文本中的“他者化”现象。此外，通过考察文本中“野蛮与文明”的二元结构如何在叙事中呈现，本研究旨在从跨文化角度重新审视人物塑造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传递方式。因此，本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以更深入地理解其中的人物塑造及其主题内涵。

关键词

鲁德亚德·吉卜林；符号矩阵；他者化；跨文化叙事；二元对立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in 'Rikki-Tikki-Tav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Square

Yujie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Rikki-Tikki-Tavi" is a short story written by Rudyard Kipling. This study, based on Greimas' semiotic square theory, analyzes the deep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ext. By exploring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in character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othering" phenomenon in the text. Additionally, by examining how the binary structure of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is presented in the narrative, this study aims to re-examine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the way values are conveyed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thematic connotations within the text.

文章引用:陈禹洁. (2025). 符号矩阵视域下《里基-蒂基-塔维》跨文化叙事解读. 文史哲论丛, 1(2), 1-6.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16

Keywords

Rudyard Kipling; semiotic square; othering;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binary opposi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丛林之书》是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代表作之一。本文选取其中的短篇小说《里基-蒂基-塔维》为研究文本，该小说虽以动物寓言形式展开，但其叙事结构与人物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者所处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识形态。因此，本研究运用A·J·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从跨文化视角探讨其深层意义。

长期以来，外国学者对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且研究议题多种多样。例如，McBratney主要探讨了《丛林之书》中人物的身份与本质，并分析了儿童自由与帝国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1]而Hotchkiss将丛林视为伊甸园，并基于吉卜林的个人经历以及文本中的角色体验，探讨文本所蕴含的深层内涵。[2]此外，Nelles研究了动物角色的视角并解读吉卜林笔下超越表层描写的深层含义。[3]

中国学者关于其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例如，陈媛和饶玉玲认为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以及相关背景信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丛林之书》的内涵。[4]而孙锦则指出其中每个动物角色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5]另一位学者徐蕴怡通过对比吉卜林的四部作品分析了其笔下的东方形象，认为吉卜林对东方的描述充满了殖民色彩且影响深远。[6]

概言之，《丛林之书》的不同研究视角被众多学者关注。其中，《里基-蒂基-塔维》是一篇意涵丰富的短篇小说，值得深入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叙事结构和主题，还在于揭示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因此，本文将通过符号矩阵理论，深入探讨文本中角色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象征意义，理解其所传播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

2. 理论框架

《里基-蒂基-塔维》中的隐喻尤为突出。而符号矩阵是一种由格雷马斯提出的符号学工具，用于研究意义的生产过程以揭示文本中的二元对立，从而深入探讨叙事的深层结构。本章将简要介绍他者化理论以及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

2.1. 他者化

“他者”是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以及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指代与“自我”相对立或相区别的存在，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分配。雅克·德里达曾在《立场》中谈到：“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在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7]而在“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中，他者化是西方社会自居为世界中心，将东方民族和文明边缘化，视为劣等、不健全的人的做法[8]西方世界将东方构建为“他者”以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

他者化不仅是对角色关系的认定，也是对不平等现象的批判与解构。因此，本文将采用他者化来解读文本。

2.2.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

A·J·格雷马斯是立陶宛裔法国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被公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键人物。格雷马斯受费迪南·德·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并将其扩展到更广泛的意义系统分析中。他试图通过形式化模型揭示意义生成的逻辑，而符号矩阵正是他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

符号矩阵深受二元对立的影响，根据格雷马斯的观点，如果一个符号 S 具有某种意义，它必然与-S 形成对立关系，即-S 代表“意义的绝对真空”。[9]S 和-S 之间是相互矛盾的。鉴于此，可以用下图的语义轴表示：[9]

$$S_1 \longleftrightarrow S_2$$

（对立关系）

因此必然会有与它们各自相矛盾的对立项：[9]

$$-S_1 \longleftrightarrow -S_2$$

（矛盾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四个符号项之间形成如下结构：[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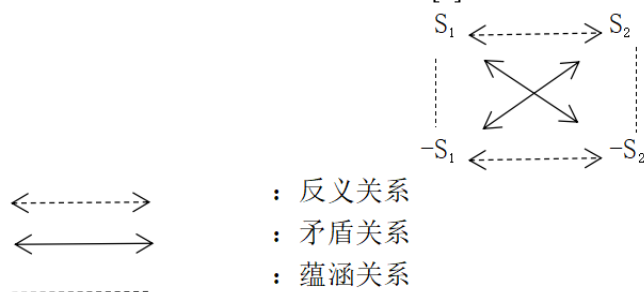


图 1. 符号矩阵

据图 1，可看出 S1 和 S2 显然是二元对立，而 S1 和-S2 以及 S2 和-S1 之间是矛盾关系，同时 S1 与-S1，S2 与-S2 是相互蕴涵的关系。

符号矩阵能够清晰地表达文本中的关系和隐含意义。根据这种关系，笔者将里基置于 S1 位置，纳格与纳吉娜置于 S2 位置，英国家庭置于-S1 位置，达尔齐夫妇置于-S2 位置。在第三章中，研究将聚焦于人物的隐含意义，并深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3. 符号矩阵与文本分析

文本背景设定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描绘了一只英勇的獾里基与邪恶眼镜蛇纳格、纳吉娜之间的生死搏斗，以及它们与白人家庭及其他动物的互动。文本中存在许多象征跨文化的元素。由此，通过符号矩阵，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角色背后隐喻。

3.1. 《里基-蒂基-塔维》的符号矩阵

基于符号矩阵理论，小说中的角色关系可建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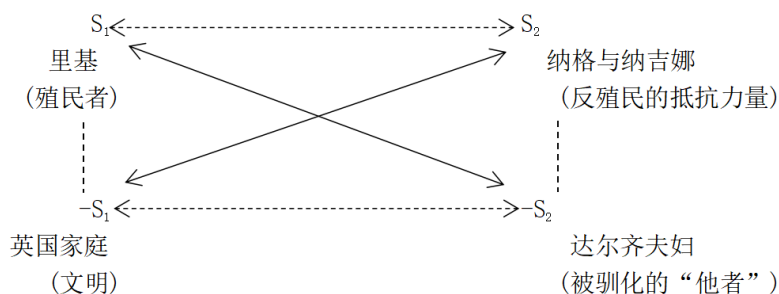


图 2. 《里基-蒂基-塔维》中的符号矩阵关系图

文本中，里基与纳格夫妇构成最明显的二元对立。里基是外来的侵入者，为了保护英国家庭及其他动物，充当忠诚的“救世主”，誓死与纳格、纳吉娜斗争。英国家庭认为，他们的孩子若有一只獾陪伴，就可以避免蛇的威胁；缝衣莺达尔齐夫妇的蛋被纳格吞食，因此眼镜蛇被塑造成了冷酷无情的恶魔。里基自视为花园的救世主，坚信猎杀眼镜蛇符合它的天性——“所有成年獾的毕生事业，就是和蛇战斗，并且把蛇吃掉”。[10]因此，里基与纳格夫妇形成鲜明的对立关系。

此外，英国家庭与达尔齐夫妇之间也构成了对立关系。英国家庭象征权力与统治阶层，享有安全保障和统治权，并具备操控里基的能力。而达尔齐夫妇则是依附性的角色，完全受制于里基，缺乏自主性，依赖里基的保护。在权力结构中，英国家庭位于最高处，他们的安全成为叙事发展的核心，而达尔齐夫妇处于最底层。由此，英国家庭与达尔齐夫妇的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

同时，里基与达尔齐夫妇，及英国家庭与纳格夫妇，分别存在一种既矛盾又不对立的关系。里基是积极的行动者，承担着守护者的角色，勇敢地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达尔齐夫妇是被动的旁观者，只能遵循里基的安排。他们的矛盾在于，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但目标并不冲突，因此他们并不彼此对立。而英国家庭是被保护的对象，依赖于里基的行动，但纳格夫妇是潜在的破坏力量，威胁着安全。这种矛盾表现在，眼镜蛇的存在威胁着英国家庭的安全，而英国家庭则为蛇的攻击目标。但这种矛盾并非直接形成，而是通过里基的存在得以体现，因此他们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

3.2. 角色的象征意义

《里基-蒂基-塔维》以动物寓言的方式构建了一套富有象征意义的角色体系。不同角色不仅推动情节发展，还在文化层面上形成对位结构，体现出关于权力、秩序与身份的深层语义逻辑。

3.2.1. 里基-蒂基-塔维：外来秩序的执行者

叙事中，里基被塑造成一只正义且忠诚的獾，其核心职责在于维持环境中的稳定与安全。然而，从象征层面来看，它代表着一种外部介入力量，以自我认定的“救世主”形象进入特定空间，即保护当地免受“威胁”。正如文本中：特迪的母亲说，“他也许会咬孩子的。”“不会的，”父亲说，“特迪和那头小野兽在一起，比一头大猎狗看守者他还要安全。比如说，要是有条蛇爬进了儿童室……”[10]

这段对话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也体现了英国家庭对里基的信任。结尾处，英国家庭再度强调了里基的英雄主义：“‘他救了我们的性命，也救了特迪的性命，’她对丈夫说。‘想想吧，是他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啊。’”[10]同时，达尔齐也一直在颂扬里基，“让我们歌唱伟大的红眼睛里基-蒂基吧！”[10]

这些描述以及里基与眼镜蛇之间的战斗都将里基塑造成了一种“秩序维系者”形象，其行动构建出特定文化视域中“正义”与“威胁”的价值框架。结尾处，里基说：“你还担心什么？所有的眼镜蛇都死了。如果他们不死的话，这儿还有我呢”。[10]通过强化里基“救世主”与“保护者”的形象，吉卜林

试图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并传达一种观念：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不仅源于环境需要，也被自然化内化为本能与责任。

3.2.2. 纳格与纳吉娜：既有秩序的延续者与对抗者

眼镜蛇夫妇是故事中的主要反派角色，承担着与主角相抗衡的重要叙事功能。文中，它们被塑造成主要威胁。纳格试图以自身的“神圣性”震慑对手：“‘谁是纳格？’他说道，‘我是纳格。当第一条眼镜蛇鼓起他的头兜，为正在睡觉的大梵天神挡住阳光的时候，大梵天神就在我们家族身上打下了他的印记。瞧吧！害怕吧！’”[10]反抗被塑造成对“文明世界”的入侵，而非正当的自我防卫。这种叙述将反抗势力塑造成邪恶、不理性的力量，并借此形成对主角行为正当性的间接印证。

实际上，纳格和纳吉娜是花园的原住民。它们的行为可被视为本土力量对外来控制机制的反应，其象征意义体现出文化边界中的对抗姿态，它们的失败则象征着外来势力对抗抗力量的镇压。纳格初次见到里基时就预见了自己的失败：“他知道，花园里有了獠，对他和他的一家人迟早意味着死亡；但是，他想要里基-蒂基放松警惕”。[10]纳格与纳吉娜象征了一种在多元文化交汇背景下被重新编码的“他者”形象，其价值与行为被叙事视角重构、边缘化。

3.2.3. 英国家庭：中心价值载体

英国家庭是事件的起源，代表着规则秩序的象征载体，即“文明”。他们不仅构成故事中“被保护”的核心对象，更是所有文化对立关系得以展开的叙事起点。文中，里基的所有行为都围绕着保护英国家庭展开，而里基也将保卫英国家庭及花园视为己任。“里基-蒂基有权利自豪，但是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就像所有的獠一样，用牙齿、跳跃、踢和咬的办法照料者花园，再也没有一条眼镜蛇敢在围墙之内露面了”。[10]这一描述强调了一种“需要保护的文明中心”形象。而英国家庭也强调了里基的“正义性”，“他救了我们的性命，也救了特迪的性命”。[10]由此，英国家庭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的隐性中轴，构成了对“他者”身份分类与道德属性设定的叙事基础。

3.2.4. 达尔齐夫妇：从属性文化角色

达尔齐夫妇象征着被驯服的“他者”。他们接受外来进入者所灌输的价值观，并认为自己天然低人一等，他们不会反抗，反而维护外来秩序。达尔齐夫妇正是“顺从的当地臣民”，不仅毫无抵抗意识，还歌颂里基：“让我们歌唱伟大的红眼睛里基-蒂基吧！”[10]

此外，在与里基的互动中达尔齐表现出明显的敬畏与从属感，例如在遭受里基的斥责时，“噢，你这个一团羽毛的笨家伙！”[10]它们仍然对里基感激不尽，并听从它的指令。这一设定隐含了一种文化层级结构中“被整合”角色的象征——即自愿服从主导秩序，接受其价值框架与行为指导的个体。

3.3. 文明与野蛮

吉卜林通过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构建出一套清晰的文化价值框架。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东方以及东方的一切，如果不明显地低西方一等的话，也需要西方的正确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11]文本中以里基为核心的叙事阵营代表了“有序、理性、勇敢”的价值象征，而以眼镜蛇夫妇为代表的对立方则被赋予了“危险、神秘、潜伏”的特质。这种二元划分不仅在角色属性中得到强化，也贯穿于行为逻辑和情节推进中，成为构建意义秩序的重要机制。

故事里里基作为“救世主”，为这片区域带来了秩序和安全。与之相对，眼镜蛇夫妇的出现则暗示着这一空间的扰乱与威胁。在“他者”被刻画为神秘而具攻击性的背景下，主角的正当性得以凸显，从而引导读者在无形中认同某种既定的文化范式。眼镜蛇的“原住性”与“正当性”并未被视为合理权利，

而是被纳入“威胁”的语义场中。因此，故事建立的并非单纯的善恶对抗，而是一种对文化空间归属权与话语解释权的隐性争夺。

此外，达尔齐夫妇被塑造成愚蠢无知的形象。他们顺从里基，为其歌颂。整个叙事中，它们没有反抗意识，没有能力，只能依赖外来的“救世主”。这种立场的确立反映了典型的父权式叙述，即某类群体的归顺，强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正当性与稳定性。这种叙述手法推进了情节发展，更在潜层叙事中构建了文化他者的再现机制。

4. 结论

《里基-蒂基-塔维》不仅展现了吉卜林的文学才华，还承载着深层的文化隐喻。本文运用符号矩阵分析了文本中“文明”与“野蛮”结构后的深层含义。研究表明，吉卜林通过二元对立，构建了一种隐含的价值系统。

此外，吉卜林通过文本中的二元对立，使文化价值取向变得更加隐蔽。同时使其更具渗透性，让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此种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引起读者对人类历史的反思，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的权利与自由。

参考文献

- [1] McBratney, John. "Imperial Subjects, Imperial Space in Kipling's 'Jungle Book'" [J]. *Victorian Studies*, vol. 35, no. 3, 1992, pp. 277-293.
- [2] Hotchkiss, Jane. "The Jungle of Eden: Kipling, Wolf Boys,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tion" [J].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29, no. 2, 2001, pp. 435-449.
- [3] Nelles, William. "Beyond the Bird's Eye: Animal Focalization" [J]. *Narrative*, vol. 9, no. 2, 2001, pp. 199-194.
- [4] 陈媛, 饶玉玲. 试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分析吉卜林的《丛林故事》[J]. *文学界(理论版)*, 2011, (02): 155-156.
- [5] 孙锦. 吉卜林动物小说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1.
- [6] 徐蕴怡. 吉卜林笔下东方形象研究[D]. 长春: 长春理工大学: 2021.
- [7] 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259-268.
- [8] Tyson, Lois 著. 赵国新等译. 当代批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 475-532.
- [9] 格雷马斯, A.J. 著. 吴泓渺, 冯学俊译.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139-161.
- [10] 吉卜林, 鲁德亚德著. 文美惠, 任吉生译. 丛林故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76-92.
- [11]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著. 王宇根译.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37-144.